

王立信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女编剧的 悲喜剧

NÜBIANJUDEBEIXIU



王立信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女编剧的悲喜剧

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女编剧的悲喜剧

王立信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203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800 册

书号：10078·3821 定价：1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取材新颖独特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女编剧程婉如为创作一个话剧剧本所历经的风波为主线，辅展开这位编剧和导演、演员、领导、亲属之间充满生活情趣的关系，折射出文艺体制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和纠葛，并把故事的骨架延伸到江南“金三角”乡镇企业的社会大舞台。从城市到乡镇，小说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上，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艺术画卷，刻画了一批从领导干部、知识分子、企业家到普通乡民的性格迥异的群象，揭示了当今社会大变革的发展趋势。

小说的人物形象生动典型，故事情节曲折复杂，描写真切自然，有较强的文学性，又颇具可读性。

引子

在湖边市一个地处偏僻、设备陈旧的三流小剧场里，市话剧团正在上演着一出六场话剧《春江水暖》。

编剧、导演、演员们为之呕心沥血的这个戏，却未能得到市文化局局长的垂青，认为它充其量不过是个二流的剧目，安排在这样的剧场演出，算是十分抬举的了。

但是，无论是为它呕心沥血的，还是对它挑鼻子挑眼的，谁也没有料到，演出时的剧场效果，却真正称得上是第一流的。

这个戏不但在表现形式上使人耳目一新，戏里那个青年改革家有胆、有识，又有人情味的故事，更是把观众招惹得如痴似醉，就象《红楼梦·葬花》一折戏里宝哥哥对林妹妹说的那样：“你若烦恼我担忧，你若露齿我先笑。”人们和这位年轻改革家的感情完全融为一体了。

一直到大幕已经落下，场灯全部开亮了，观众仍然沉醉在剧情之中。剧场里有几秒钟是寂静无声。这时即使有一根绣花针落到地上，大概也能听得清清爽爽的。而当人们醒悟了过来，那一阵近似狂热的掌声，又真象通常说的，是暴风骤雨一般，简直要掀翻了剧场年久失修的顶棚。

紧接着，那些被演员们的风度和才华所倾倒的年轻姑娘和

小伙子们，便呼啦啦拥向台口，想更靠近，更清晰地一瞻艺术家们的风采。

他们的这种举动，并非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。他们对这些艺术家们，确实怀有一种崇敬的感情。

令人失望的是，在站成一排向观众谢幕的演员当中，独独没有那位扮演青年改革家的男主角。

奇哉怪也！哪有主角不谢幕的呢？难道他今晚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，连这点时间也不能延搁，戏一演完就赶紧卸妆，匆匆离去了吗？

于是，人们又纷纷向剧场的后门拥去。如果能看一看他卸了妆的庐山真面目，或者还能跟他握一下手，谈几句话，这对戏迷们来说，不更是一件快意的事么？

然而，刚才在台上还是生龙活虎一般，时而激昂慷慨，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又情意缠绵的那个演员，此刻却昏昏沉沉躺在担架上，由两个和他一样还没来得及卸妆的年轻演员抬了出来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人们正在疑惑不解，又见一个象是三十来岁的女子，急急匆匆地拨开众人，踉踉跄跄地奔到担架跟前，两眼泪汪汪，向他俯下身子……

“玉川，我谢谢你，你演得真好……”

“婉如！谢谢你……应该谢谢你……”

她是他的什么人，人们是不难判断出来的。可她和他刚才的这些言辞、举动，有怎样的内涵？她和他心里，又如何涌塞了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种种的滋味？观众当然是很难猜测得出来了……

第一章

一九八三年的早春二月。

这一天清晨，太阳刚才出山，月亮还挂在天边。含山湖上，从这边看，金光耀眼；从那边看，是银光闪闪。

在湖边市的湖边大街上，还没有什么行人，只急急匆匆地走着程婉如这个湖边市文化局创作室的女秀才。

她穿了一件蓝、白两色相间的拉毛高领套衫，一件米黄色薄花呢的短大衣，下面则是一条咖啡色的直筒长裤。当此初春时节，她这一身穿着，似乎略嫌单薄了些。

其实，还在二十多天之前，时令才交立春，一些爱好俏丽的姑娘们，就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春装，让她们那苗条的身子，从冬衣里挣脱了出来。尽管现在女性的冬衣，特别是年轻女性的冬衣，并不是肥厚臃肿的棉袄，而是细薄轻软的羽绒衫了，但姑娘们仍然耐不住让自己所特有的、富有魅力的线条，再被严严实实地遮掩着了。

程婉如当然算不得年轻，也早就不再是一个姑娘。她已经是丈夫的妻子，儿子的母亲。但她生就了一副苗条的身材，也是

一个爱好俏丽的女子。每当冬春之际，春夏之交，她的穿着打扮，还是要比一般的人提前一两个节气。更何况，从新年伊始在文艺界吹起的一股革新之风，使她在事业上又有一点小小的得意。

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老国画家，她从小也着意过丹青，可惜虽有慈父亲授，笔墨上总不见有多少灵气；在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了几年，分配到湖边市话剧团来，扮演过几个角色，亦不见有什么光彩；后来得到一个机缘，搞起了剧本创作，倒逐渐显露了才华。前些年，写了个五场话剧《明天》，在省内引起过一阵轰动，还因为她这匹“千里马”，造就了一位“伯乐”。

此后，她便“马不停蹄”，到长江三角洲深入生活，访问了若干江南乡镇名人，写出了一个《春江水暖》。而且剧本已经引起了湖边市话剧团年轻的女导演肖瑜的兴趣，打算选拔一些有事业心的演职员，建立一个剧组，试行创作承包，推动剧团的改革。这个计划虽然在前一阵遭到冷遇，但最近听说，市文化局的杨轩然局长提出一个口号：“在全面改革之年，全面演改革之戏。”表示要把这个本子推上去。

简直是天时！地利！人和！

但程婉如不愿意象一只纸糊的风筝，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，她希望靠自己的翅膀奋力飞上去。因此不甘于将剧本匆匆拿出去交差，决心来一个顺利形势下的“卧薪尝胆”，努力把它改得更有情趣，更有特色。

看来，心劲是可以转化成身上的热能的，她竟与那些年轻姑娘们采取同步行动，断然脱去了鸭绒滑雪衫。而且，她打算就以这样单薄的装束出远门去。

过去，每当她和丈夫同时出差，儿子总是由隔壁老阿婆代为照料。这次，湖心宾馆为使壁上生辉，特邀老画家前来小住，请

他将含山湖和湖心山的景色，绘制几幅中堂和条屏，老画家的夫人也陪侍在左右。现在既然女婿在外演出，女儿又将远行，老夫妇俩便从宾馆移榻过来了。

妈妈见女儿这一身打扮，关心地劝说她：“不行啊婉如，‘吃了端午粽，才将棉衣送’哩。”

她笑笑，并不听从劝告。

隔壁老阿婆跟妈妈所见略同，说：“是啊，‘春天要焐’嘛！程阿姨这是‘爱的俏，冻得跳’噢！”

她又笑笑，依然是我行我素。

还是爸爸比较宽容，他对老伴笑道：“二八月，乱穿衣。由她去吧！”

两位老太太这才不再唠叨。她也就赶紧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和女人们必须用的一些小件头，上路了。

她走到街边一个邮筒跟前，停住了脚步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封信，想投进邮筒；一转念，又缩回来，再一次仔细地检查了封口和邮票，看贴得牢不牢，还把信封正面写的收信人地址、姓名，逐字默念了一遍，确定了没有丝毫差错，这才重新伸出手去，准备把信投入邮筒。

突然，一个男人从她身子后边冲了过来，一把抢走了她手上的信。

她吓得跳了起来，慌忙窜到邮筒后面，转过身来，瞪大了眼睛一看，却禁不住又惊又喜，喊了起来：“玉川！”

“夫人！”

原来抢她信的男人，正是这封信的收信人，湖边市话剧团的演员，她的“如意郎君”孙玉川。

她从邮筒后面，走到丈夫跟前，故意略带夸张地用手捂住胸口，笑骂道：“冒失鬼！把我的魂吓掉了！”

两个文化人，一对嗲夫妻，味道自然足得很。孙玉川还是刚才称她“夫人”的那副腔调，指指自己的嘴巴，说：“掉在我这里了！来来来，我给你送回去。”说着，就要上前去亲亲她。

“大街上！”

程婉如忙将他微微推开了一点，接着就问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孙玉川又亲昵地说：“想你。”

“想我？”程婉如笑笑，“想我怎么不早一天赶回家来？”

孙玉川说：“昨天晚上演出结束之后，才决定让我回来一趟。我一声得令，切里卡察卸完了妆，连夜餐也没顾上吃，跑到火车站，跳上十二点多钟的夜车就赶回来了。没想到未进家门，就遇夫人，真是太巧了！……”

程婉如摇摇头，说：“真是太不巧了！马上我就要到火车站去，赶六点一刻的早车走。”

孙玉川一愣：“走？”

程婉如又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也是昨天才决定的，我连夜给你写了这封信。”

孙玉川忙问：“你上哪儿去呀？”

程婉如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时间不早了。你送我到火车站，我路上跟你说。”

正好，来了一辆公共汽车。车门一开，程婉如就轻捷地跳了上去。

“婉如！”

孙玉川喊她，是想叫她不要忙着走，因为他既要问她上哪儿去，更要告诉她，自己为什么来。可一看售票员快要关门了，又听亲爱的妻子在催他：“玉川！快上来呀！”只得也赶忙跳上车去了。

二

《湖山晚报》上发表过一篇对孙玉川、程婉如的访问记，记者为了增添行文的情趣，用的标题是《郎貌女才》。可这个标题并不妥贴，它可能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：似乎程婉如是个其貌不扬的才女，而孙玉川则是个不学无术的美男。

其实，不然。

前面说过，程婉如身材苗条，衣着时髦，虽年已四十，仍然十分俏丽，只是因为这些年她在戏剧创作上的成绩，人们提起她来，都称她是“女才子”，“女作家”，“女秀才”，便不大注意，也不大议论她的容貌如何了。

而孙玉川呢？他早年是省城一座最高学府里中文系的高材生，分到湖边市话剧团来，原是为了搞剧本创作。有一次，导演临时请他顶一个不起眼的角色，他竟脱颖而出，得了个满堂彩，从此便演戏成瘾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结果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，他与程婉如互相调换了一个位置，各得其所，且又相得益彰。现在人们提起他来，总是赞佩他的台容、台风和表演艺术上如何的“漂亮”，如何的“帅”，却不知道象他这样具有丰富的古今中外文学知识的演员，不仅在湖边市只此一人，即便在省城，也是不多的。

这夫妻俩还有一事，也被人们传为美谈。

程婉如是中共党员，是湖边市文化局创作室的党支部委员；而孙玉川却在去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，最近又被选为民盟的市委委员。常有人跟他俩开玩笑，说：“‘长期共存，互相监督，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’这十六字方针，在你们这儿一定是执行得最好的了。”

开玩笑的人有所不知，这对恩爱夫妻在家庭生活以外的某些问题上，看法也常常是不一致的。他总认为她太迟钝，她又觉得他过于敏感。

这会儿，当程婉如一说出又是要到柳溪乡的服装厂去，孙玉川就很不以为然：

“还去呀？你的本子不是搞好了吗？”

程婉如说：“本子是写出来了，可我自己总是不满意。正好昨天碰到柳溪乡一个采购员，谈了服装厂最近的一些事，蛮新鲜，也蛮有趣的，我想去摸摸材料，把本子再磨磨……”

孙玉川打断了她的话头，说：“只怕你这样慢慢地摸呀，磨呀，人家的本子早进排练场了……”

程婉如听了这话，也一愣：“谁的本子？”

孙玉川说：“昨天上午，我们诸葛团长交给肖瑜一个本子，是贵创作室那位‘老不编剧’的老编剧写的……”

“哦！”

程婉如皱了一下眉头，一时没有作答。

提起这位“老编剧”，程婉如是很熟悉的。此人姓王，名年，不但在湖边市文化系统是一位老前辈，据说还是比市委领导班子里所有的人党龄都要长的老资格。他与前市委书记、现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田老关系很好，不止一次陪同田老外出参观访问、视察工作，当领导同志旅途劳顿之时，他每每能插科打诨，博取一笑，以消除疲劳。然后，又每每要在报刊上发表一两首《陪田老视察有感》之类并不注重音韵格律的诗词，以歌颂老革命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。有那不晓事的迂腐文人，说他这是既为田老歌功颂德，又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，一箭双雕。他听了，只是宽宏大度地一笑，绝不因此便故意避嫌，而稍微放松这类有益的活动。

他每年还要到果园、酒厂、海滨、渔场这样一些地方深入生活，虽然常常因工作需要，被召回城，使他只能蜻蜓点水，走马看花，但他总是每到一处，便与当地干部亲同手足，便对当地特产了如指掌，临走时，人家总要让他带回整箱整筐的干鲜果品，陈年名酒，南北海货。他为这些盛情所累，便每每不能带回片纸只字。于是，又有一些尖酸的秀才，在“老编剧”三字当中加一“不”字，说他是个“老不编剧”的老编剧。

其实，王年自己也十分苦恼。他曾经有过若干次的创作冲动，也曾经构思过若干个剧本提纲，但早些年当然是因为受“文艺黑线专政”的迫害，未能成篇；前些年当然又因为受“‘文艺黑线专政’论”的摧残，难以完稿；近年来，王年有诗句描述过自己的苦况，曰：“提笔未写身先病，常使作家叹不幸。”据说，田老读了这诗，还禁不住凄然落泪。

然而，事物总有两面性，即“祸兮福所倚”吧。这种“不幸”，有一段时期却正是他的“大幸”。因为他除了那总共不过百十字的“颂诗”，再没有任何作品，所以，每次政治运动一来，不管是反右派、反右倾，还是文艺整风、搞四清，甚至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批“黑线”，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有些人在批判别人时，尚有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恐惧，而他则毫无后顾之忧，总是一往无前，上纲上线本领之大，常常令一些主持批判会的“革命小将”也瞠目结舌。

又然而，“福兮祸所倚”，大概正因为他太会给别人上纲上线，自己也就深怕授人以柄，不敢也不能写任何东西了。

程婉如对这个王年，倒并无特别的反感。尽管她自己从不愿在领导同志身边跑来跑去，也不好意思在深入生活、参观采访的地方买人家的土特产品，但她觉得不必以自己待人接物的一套去衡量别人；“文革”中，她跟王年不在一个单位，没有受过他

的直接批斗，对他那上纲上线的本领，也就缺乏亲身的感受，何况自己在“文革”中也不是一贯正确，哪敢对别人有所苛责呢？至于在创作上，她更不敢以自己的一两个剧本去傲视别人，去嘲讽同行。因此，她不仅从来没有在人前，在背后，在嘴上，在心里，讲过“老不编剧”这绰号，而且还不止一次对王年表示过同情。

这会儿，她听丈夫说，王年搞出了一个剧本，觉得人家也确实是不容易，因此，她想了一下，便对孙玉川说：“只要本子好，肖瑜就先排它嘛……”

孙玉川忙又打断了她的话头，说：“好？能好吗？肖瑜说他是无心创作又无才，胡编乱造瞎胡来。可这个剧本他是塞到田老那儿，再由田老交下来的。田老还给杨局长和我们诸葛团长写了信，说这么一位老同志，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搞出本子，马上文艺界体制改革，恐怕有人会说闲话，希望满腔热情、千方百计将他这个本子推上去……”

将自己的本子通过某个领导人交下来，这是常有的事，而且也各有缘由，有的甚至是出于无可奈何，程婉如并不感到奇怪。使她感到新鲜有趣的是：这一次竟是文艺体制的改革引起的，她不禁笑道：“好嘛！这说明改革确实能把很多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……”

孙玉川忙又插上说：“可他们这种做法不是对改革的亵渎吗？”

程婉如看看丈夫，见他情绪激动起来，便笑着安慰他：“总要看本子质量的，你放心……”

孙玉川却又冲冲地说：“我不放心！贵党在文化界是很有一些糊涂官的。”

“你！”

程婉如瞥了丈夫一眼，对他轻轻杵了一声，埋怨他用这样的

词句，这样的语调和她说话。

孙玉川看出了妻子的意思，略微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说：“肖瑜也很恼火，她说要给杨局长打电话。又跟我说：你跑一趟美差吧，回去探听一下，婉如的本子改定了没有。还要我最好把你拉到千山去。”

程婉如说：“你把情况告诉她，我一定尽快将本子改出来。反正你们还有两个点的演出任务嘛！哎，在千山演出情况怎么样？”

孙玉川摇摇头，说：“不好。这个队伍实在是拖不动了。排戏不象排戏的样子，演戏也不象演戏。我们过去跑个群众也总是兢兢业业，老老实实坐在排练场看导演排戏，一两句台词，上场之前还在边幕后头默念好几遍。可现在，排练场嘻嘻哈哈，上了台松松垮垮，导演一分一秒扣的节奏，到了台上全没了。肖瑜说，她真想大吼一声：不愿干的给我滚！”

程婉如听了这些，也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孙玉川又说：“肖瑜跟我们扯了个方案，就等你的本子交出来，她马上拉出一个剧组……”

程婉如说：“那我更要把本子改得好一些。否则，不也是对改革的亵渎吗？”

孙玉川知道妻子的脾气，她是个外表温顺随和而并非没有主见的女人，何况她的话确有道理。看来这回是留不住她了，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你呀！……”

程婉如见丈夫不再坚持他的意见，便瞄了他一眼，将身子跟他挨紧了一些，以表示她因不肯留下而对他怀有的歉意。

过了一会儿，孙玉川又重新起了一个话题，问道：“有关局里、团里领导班子的调整，听到什么消息没有？”

程婉如又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有。”

孙玉川一笑：“保密？”

程婉如说：“真没有。我整天忙着改剧本，哪有心思去打听这些事？”

“可我们在外面却很关心，也很担心。”

程婉如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们哪！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当今之世，不管谁当局长，谁当团长，他也不能反对改革。何况杨局长本人就是一个改革家！”

孙玉川听她这话，很不满意：“你呀，把什么事都想得很简单！贵党一些糊涂官办的糊涂事，难道还少吗？”

程婉如听他又用了“贵党”这两个字，也很不满地沉下脸来，问他：“你今儿是怎么啦？”

孙玉川不作声了。

他今天这样的情绪，使程婉如忽然想起了最近听到的一些议论，觉得有必要就这些议论跟他谈谈，便问道：“听说你们民盟在几个剧团乱拉人？”

“什么叫乱拉人？”孙玉川又激动起来，“民主党派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组织，这是贵党……”他忽然发觉用这个词来谈这件事，确是很不适宜的，便忙改口道：“这是党中央的政策！”

程婉如顿了一下，又问他：“可梅香萍说‘共产党太叫我寒心了，我还是参加你们民盟吧’。你们也把她吸收了？”

“嗬，玩意儿还不少嘛！”孙玉川带着明显的嘲讽意味，轻声一笑，说：“第一，梅香萍的原话不是这么说的；第二，她对共产党和我们民盟的性质及相互关系，看法不太正确；第三，因此，我们还没有吸收她。”

程婉如松了一口气，点点头，“唔”了一声。

这时，孙玉川却又对妻子带有戏谑意味地一笑，轻声说：“没吸收她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个人发觉，她想参加我们民盟是醉翁之

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……”

程婉如听了他这话，也轻轻一笑，忙说：“我可根本没有想这些……”

夫妻俩这是打了一个哑谜。随后，孙玉川又回到了正题，说：“其实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在要求参加共产党人当中，不是也有动机不纯的吗？有的人身为共产党的干部，不是也不理解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吗？”

他见妻子没有反驳他，就又接着说：“前些日子，我们问肖瑜是否愿意参加民盟，肖瑜说她还是想参加共产党。这个想法也是正常的。我告诉她，参加民盟并不影响参加共产党。这事就算过去了。可我们团长诸葛江竟然到处说，他被肖瑜的话激动得流下了眼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民盟是在野党，是反对党吗？搞得肖瑜倒很尴尬，很恼火，她说：我就参加民盟了，让他伤心得流泪吧！我劝了她：不能赌这种气。嘿！我真不明白，作为中国人民智慧化身的诸葛亮，怎么会有诸葛江这样的糊涂子孙！我看他这个姓肯定是冒牌的。”

程婉如觉得丈夫回她的这些话，不无道理，特别是他对诸葛江的评价，她颇有同感。便说：“别激动呀！我不过是提醒你一下……”

孙玉川也忙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长期共存，互相监督嘛！”

程婉如倒被他逗得笑起来了。

笑，尽管是笑了，然而，程婉如实在没有想到，她这次跟丈夫难得的相会，竟然一下子蹦出了这么多敏感的、尖锐的问题。尽管他们都顾忌到车上有驾驶员、售票员和几个乘客的存在，没有将争执变成争吵，始终把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她明显地感到，在如何看待湖边市文化系统当前的形势上，丈夫和她的不一致，是在她热乎乎的心里，吹进了一股小小的冷风。